民间秘密社会与晚清结社法律

刘康磊, 杨添翼

(济南大学法学院, 山东济南, 250022;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晚清内忧外患, 严酷的社会环境是滋长秘密社会的温床。群学思想的传入和其“合群”思想的流变, 夹杂着其他泰西政治制度的观念被国人了解和接纳, 原有秘密结社的扩张和新兴的以“文人结社”为蛹的政治团体, 是晚清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法忽视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缺乏力量, 在希望变化的急切愿望与现实发生错位的情况下与前者合流一处, 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晚清; 群学; 戊戌变法; 秘密结社; 政党

中图分类号: D9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6-0069-06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 存在着一种与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正统社会秩序”相对抗的社会力量, 这便是秘密结社和会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统治者将这两种社会组织定义为“匪类”, 严令限制。晚清政府对待结社态度既反映了中国传统对会党的态度, 又有西方思想冲击的痕迹, 展示了结社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延续和变化。晚清的中国社会, 社会组织呈现出新的态势, 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家庭、宗族等基本社会单位和秘密结社之外, 还涌现了经济性质的组织和政治社团。晚清政府对结社的态度体现在对待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各有不同, 对同样类型的社会组织在不同的时期亦有差异。寻其历史脉络, 晚清政府对待结社的态度在张弛之间皆以政权稳定为定准。

一、晚清结社的群学输入背景

晚清危局, 内外交患。西方列强对我侵害不断, 国耻弥漫神州, 甲午之战、日俄战争, 撮尔之国日本的胜利如在国耻之伤上撒了一把粗盐, 黄种劣于白种的遁词已无法提供有效的心灵慰藉; 同时, 这也破灭了实业救国的残梦, “宪政”成为学习西方的重中之重。群学的概念假此风潮成为晚清社会一股重要的思潮来到中国,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此鼓呼声竭, 企以此改变中国上下离心, 互为依赖, 推脱责任的民族痼疾。^{[1](289)}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在加拿大

成立了“保救大清兄弟会”, 将清朝衰弱的原因归结为“士人”不能合群, 而士的沉寂, 造成的结果是民与国之间的交流不畅, 使得社会死气沉沉, 在面临外侮的时候, 不能上下一心救亡图存, 因为要救亡必须要“合群”。绅士这个基层在中国政治上起到了连接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普遍教育和群众启蒙实现以前, 许多地方有赖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有功名的绅士——的领导。一方面, 这个阶级构成地方上的社会精英力量, 相对受过较好的教育, 能力也较强。另一方面, 和官僚们比较, 绅士更适合于领导民众, 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民众, 与民众的关系也较密切。梁启超曾经说过: 绅士“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 可以通上下之气”。^①但是, 绅士自身的能力却无法在外强入侵、内乱不止的情况下达到此种目的, 因此学会成为锻炼和教育绅士的一个重要组织。康梁师徒二人还身体力行, 成立学会, 倡风气之先, 其后学会、会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②

当时的学人将“群”的观念与文人的结社自然地结合起来。康有为曾说: “夫挽世变在人才, 成人才在学术, 讲学术在合群”, “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 皆由学会讲求之力。”^③谭嗣同将“群”完全等同于学会, 认为可以通过学会实现“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的目的^{[2](443-444)}。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同样认为: “国群曰议院, 商群曰公司, 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 其识论业艺, 罔不由学, 故学会者, 又二者之母也。”^{[3](31)}

收稿日期: 2009-12-10; 修回日期: 2010-03-30

作者简介: 刘康磊(1982-), 男, 山东梁山人, 济南大学法学院教师,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检察院政治处工作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 宪政理论与政府治理; 杨添翼(1982-), 女, 湖南长沙人, 西南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宪法。

梁启超将西方宪政体制中的结社与群学与中国传统的士绅政治联系起来,他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起点”,“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维何?惟归之学会而已。”^{[4](553-555)}这些维新人士羡慕西方的政治制度,认为学会的发展将意味着西方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出现的契机。

“强学会”的势力发展引起了清廷的不满。^④在守旧大臣的鼓噪下,仅“强学会”所办刊物不使用清代的纪年方式而采孔诞纪年已令朝中守旧大臣颇为不满,杨崇伊以“遇事生风,常于松药庵广积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5](3505)}亦奏请将此会关闭。“强学会”虽因此而关闭,但是“学会”引发的结社热潮已经不是清廷所能控制。随着各种结社组织的出现和西方政治理念的输入,尤其是实行“新政”后,资政院和咨议局的纷纷建立,时人对于结社和政党已有诸多认识。宣统二年,杜亚泉总结了当时社会舆论和学术观点,将人们对于结社和政党的观念归纳为:在政党的有无问题上存在三种观点,其一为政党不能有,其论点核心在于移植西方政治体制,需要大多数民众的觉醒,如仅有少数人热衷,则宪政未必能够成功;其二,政党不可有,此种观点认为,政党左右舆论,乱政误民,非是宪政之必需;其三为政党为宪政之子,此种观点认为政党乃宪政中之要义,要建立宪政,非要有政党不可。而政党的作用根据杜亚泉总结为四端,即对抗政府、统一舆论、政党政治和调查时务^{[6](57)}。

在此种环境下,中国的结社,无论是传统的秘密结社,还是在学习西方基础上形成了以“文人结社”为基础的政党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二者在面对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外来侵略的共同敌人时,自觉和非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合流为一,成为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一股合力。清政府对待此二者的态度,随着威胁其统治的力量的改变而改变,但不变的是,民间的秘密结社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缺乏把握时代潮流的能力,无法避免被清廷和革命党争相利用的命运。

二、晚清政府对秘密结社的态度

秘密结社的字面含义,日本学者海野宏做了如下考证:英语的“秘密”secret 这个字,sec-表示脱离、隐藏,或也可解释成断裂。在 secret 一字中,由-cre 衍生了 crisis(危机)、critic(批评)等词汇,意即在某种局面(危机)中做出批评、辨识、拣选。换言之,secret 这个字,表示在面临某种危机之际,脱离共同的场域与认知,隐藏于他。^{7}

秘密结社在中国拥有长久的历史,这些民间的秘密结社,在“明清易代之后,由于满族人的“异族”统治,以汉族人作为主要构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在“反清复明”的旗号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在中国下层社会形成盘根错节、世代相沿的巨大势力和复杂的联系网络。他们活动的隐现起伏,直接反映了政府统治的治乱兴衰。”^{[8](35)}陶成章认为:“中国的有反对政府之第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9](414)}而在晚清掀起风浪的义和团的前身正是所谓的“白莲教”,对待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性组织的态度,晚清政府视其为“邪教”,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势。清代的秘密结社是在18世纪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空前发展起来的,从性质上而言,这些结社组织是民众的自救自助组织,代表和反映了当时对于政府不满者的利益、愿望和信仰。这些秘密组织中的“白莲教”在清代引发了数次反叛运动,尤其是到了清末,在“乾隆末年,因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白莲教的各支派又乘势而起。仅湖北、四川、陕西、河南边界地带,就有混元教、西天大乘教、收元教等三大支派在活动,其活动方式由秘密转向公开,其活动内容也逐渐由宗教传布转向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斗争。”^{[10](15)}清政府对此采取了多次镇压,道光帝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说:习教传徒,久干例禁,进来匪徒故态复萌,实堪痛恨,比应密速查拿,认真办理,以期净绝根株。

在西方列强到达中国之前,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已有一定的气候。其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到来引起社会结构变化,秘密结社在中国重新兴盛起来,并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力量。晚清政府对其态度的变化,可以说是利害权衡的产物,即在外来势力和本土自反的发对势力之间两害取其轻。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义和团的口号由“反清复明”变为了“扶清灭洋”,但是这种政治口号的改变被政府所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随着外国列强侵华的加剧,政府的态度由排斥逐渐变为客观看待,山东巡抚李秉衡所调查的是:“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企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一驱之也。”^{[11](5)}其继任者毓贤也持此观点,他在处理山东

济宁红拳反教会斗争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平民学习拳棒,多系自保家身。惟前受教民欺太甚,加之外来匪徒乘机煽惑,遂各怀报复之心。”之后,他又说道:“山东民情强悍,因屡受教民欺侮,积不能报,多习技勇自卫身家,其事容或有之。至于聚众逞凶,只是外匪乘民教不知,从中挑衅生事。”^{[12](364)}山东几任巡抚对待义和团的意见在当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时人看来,“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外国的谋反者。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和教义是以炮舰为后盾的。保守的爱国人士憎恨和害怕这些洋鬼子。”^{[13](157)}并且,这些晚清官员在有教堂的所辖之地的权威也受到了直接的挑战。

后来,张汝梅建议将私会变身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民间秘密组织官方化,并利用这些组织的力量与外来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张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默许,首先在山东,之后在直隶和奉天,这一政策都得到了贯彻。但是这一政策导致民间秘密结社团体的急速发展,并超出了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革命党人逐渐渗入到秘密结社的“会党”中,使之成为“新军”之外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张玉法先生曾总结:“近代中国,除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革命运动外,秘密结社的存在,亦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一,清代秘密结社具有反满的传统,容易与革命运动合流;其二,秘密社会渗入群众的基层,革命党人可利用秘密结社的组织关系,网罗群众。”^{[14](57)}张玉法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史论》中考证说:“会党之所以与清季革命建立上联系,是革命党人策动的结果。……且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可以说脱胎于前此二百年的会党活动。”在革命党的策动下,在会党活跃的中国南方,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革命党与秘密会党的合流,造成了秘密结社性质的变化,即主义上的变革,原有的“反清复明”的旗号不再被彰显,而转换为革命的主张。秘密会党的作用甚至在辛亥革命各省的“光复”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⑤

三、晚清结社法律的产生与变化

晚清结社法律的制定在当时已成大势所趋,其结果对于文人结社和政治性组党的有限制放开。文人结社是几千来士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明代之前的文人结社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从士阶层的崛起到文人团体的形成和群体意识的张扬,为后世的文人结社风气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第二阶段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文

学团体涌起,并出现了第一个以“社”为名的结社团体“白莲社”;第三个阶段为这一时期的文人结社以“诗社”为主要形式;第四个阶段为宋元时期,文人结社遍地开花,蔚然成风。^{[15](46-52)}明代的文人结社在之前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逐渐超出了文学和学术的领域,成为政治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前朝的文人团体的庞大和干政,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初,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于顺治九年(1652年)下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康有为曾说:“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故畴昔中国数千年无之,其有党也。皆为君主所深恶。故汉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党人碑,明之东林、复社皆罪之。本朝学官皆立卧碑,以立党为大戒,谨愿者避之,盖政党於专制整体实不相容也。”^{[16](314)}直到晚清之后,这种状况随着中西之间的矛盾超越满汉矛盾、亡国灭种的危险盖过其他社会对立现象而发生了改变,如戊戌变法时维新志士发起成立了少数政治团体。日本学者宗方小太郎曾经说道:清朝祖先鉴于历代之乱迹,建国之初便多方预防弊政,防止祸乱于未萌状态,其中如以法令严禁组织会党,故在三百年之治世中党祸颇少者即系此故。从而带有政治性之会党至光绪末年前亦不多见。但经过甲午之战、戊戌政变,政府纪纲弛废实力暴露之后,人民议论政事之得失者渐多,以至有人组织政治会党,及至日俄战争后颁布宪政预备上谕,两宫驾崩,宣统继位,成立咨议局、资政院等以后,便公然组织政党,遂起官民交争之端。^{[17](109)}变法失败后,慈禧又严禁结社立会,因此,在1906年9月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前,虽然各种团体在国内已经遍地开花,但是却没有公开的政治团体出现。

清廷预备立宪诏旨颁布以后,立宪派认为朝廷既然决意立宪,就应当完全像立宪国家一样,实现结社集会的自由,实现所谓的庶民议政,于是筹建了第一批立宪团体。^⑥在此过程中,御史赵炳麟的积极行动颇为引人注目,他先后两次上奏朝廷要求放开结社。赵炳麟第一次上奏说:“开会、结社,未可一概禁止。”“方今时局艰难,正赖京外士民同德同心,讲求政学,若不分别办理,一概禁止,实非治平之道。”“妥议章程,凡研究政治、法律、农商、教育等会,必报部立案,一经核定,国家力任保护。其妨碍治安、不守法律所规定者,即行查禁。似此分别办理,庶合朝廷预备立宪之至意。”^{[18](5859-5860)}数月后赵炳麟第二次上奏称:“迩来民智渐开,咸知家国一体、休戚与共之义,其望治之心切,斯其忠义之气张,迎其势而扶植匡正之,可以养成尊君亲上、尚公敢任之民俗。臣愚以为一切

言论、集会之事，但须明定法律，使之不悖于尊卑之大防，而民间之请愿要求，亦宜曲为转圜，不可过事禁抑，以阻其欣欣自向之意。否则，情志不达，至于相激，奸人得乘间以肆其簧鼓煽诱之术，甚至横溢冲决，不可收拾，则臣有不忍言者矣。”^{[19] (320)} 1908年3月11日，宪政编查馆大臣上奏的《结社集会律》颁布实行。^{⑦⑧}

《结社集会律》共三十五条：除第二十条明令禁止秘密结社，还规定了“和平集会”的原则，非政治性结社集会不必呈报、经官批准立案的结社集会不在此限外，关于政治性的结社集会的主要限制为：(1) 发起政事结社，由首事人开具宗旨、名称、社章、办事处、设立之年月日，首事人、佐理人和办事人的姓名、履历、住址，现有入社人数，呈报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在京申报民政部核准，在外由巡警道、局呈本省督抚核准，咨部存案。(2) 军人、巡警、官吏、僧道及其他宗教教师、教习和学生，未满二十岁的男子、妇女，曾判监禁以上之刑者，不识文义者，不准参加政事结社和政论集会。政事结社以一百人为限，政论集会以二百人为限。政论集会时，巡警或地方官署得派遣人员临场监察；集会或游行之际，如有任意喧扰或迹涉狂暴者，巡警或地方官署得量加阻止，有不遵者，得勒令退出；集会讲演如有语言悖谬或滋生事端、妨害风俗之虞者，巡警或地方官署得饬令中止。(3) 无论何种结社，若民政部或本省督抚及巡警道、局和地方官为维持公安起见，饬令解散，或令暂时停办，应立即遵照办理。无论何种集会和游行，巡警或地方官署为维持公安起见，得量加限禁，或饬令解散。还规定了对违犯者处以罚金、拘留、监禁处分。

《结社集会律》颁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评论，对于该法律对于结社的严格限制，民间微词颇多。保廷梁在宣统二年曾出一书《大清宪法论》，其中对于宪法结社自由的原由与限制进行了详密的论述，就结社自由的必要，他说：凡人不能无同志，有同志不能无会合，或为商榷公益或为研究政治百科或为时节怡乐游览，同志之事不一。而会合之时尤多。苟国家一干涉，不能因其所志而予以自由则其抑郁之气横结于中，其极必致有溃决之一日者，此欧洲各国之经验也，故不能不假以会合之自由也。同时，他也结合晚清的《结社自由律》对结社自由的限制进行了分析。首先他认为，结社自由得有法律之限制，“就《结社自由律》观之，则采之主义有三，一曰核准主义，二曰呈报主义，三月放任主义。核准主义专适用于政论集会，其余则概以放任主义括之。然而，例外亦有。”^[26] 尤其是对于政治结社的限制意见尤其大，时评有云：

“其开宗明义曰君主立宪也，而所定条文则不严于别项之结社集会，而独严于政事之结社集会(限以百人不止何据以然)。”^{[20] (23)}

当时社会上对于《结社集会律》的意见并不局限于学界，各省对于该项法律审议后，其意见最后形成了修改后的《结社集会律》，并得到通过。这一立法修改审议的过程，是超越该项法律本身而值得推崇的中国法治和宪政的进步。1909年，陈敬第、沈钧儒等十几名议员在浙江谏议局开会时，提出：结社集会“不应设何种之限制”，限制人数“与立宪之旨绝对不相容”，必须“削除”。^⑨在1910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资政院会议上，法典股议员审查了谏议局议员联合会的陈请，认为既然允许国民结社集会，“而忽然于人数加以限制，颇觉不合”，应将这一条“全然删去”。原律限制教习、学生结社集会，“现在明白法律、政治的人，大半皆从事于教育，若是加以限制，则于政党发达大有妨碍”，亦把这一条删去。还提出，原定“维持公安起见”，并未定出条件，没有界限，应改为“认为妨害治安”。^{[21] (465)}最后的立法尊重了议员的意见，通过了对于《结社集会律》的修改。

但是，此项法律对于秘密结社的限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而各个政治性组党的会社却对其的利用更为迫切，在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共进会”的章程中，可见政治性会社对于秘密社会的复杂态度，也从中可体味秘密结社在晚清的尴尬地位。一方面，共进会对于民间会党力量的依靠，“绝不是一新策略”，为了推翻满清，必须动员这些人，改造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英雄”；另一方面，却认为会党虽然应当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些秘密会党的人员许多人沦为赌徒、土匪和盗贼。^{[22] (77-87)}此项律令颁布之后，结社之风更甚，虽然其中有禁止秘密结社的规定，但是数千年来秘密社会不会因为满清政府的一纸律令而消失。并且，以“文人结社”为基础和实现士人匡世救困梦想的各种团体，自身没有任何力量，在急切的变法欲望与缓慢的现实之间产生的断裂中，开始寻求会议之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秘密会党深入底层的力量则被他们所看中和利用。

四、结语

如何有利于维护政权的延续是晚清政府对待结社的态度，在此前提下，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种力量的对比变化来决定具体的政策：外患与内患(民间反对势力)、保守派与革命派。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又受到

官员的个人利益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一种晚清政府在对秘密结社上态度的波动回环和对待政治性政党从严禁到放开的明确趋势的对比。民间秘密结社由于与时代的脱节,成为被晚清政府和革命力量利用的工具,丧失了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机会。

注释:

- ① 参见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43. 当时的所谓“绅士”阶层难以胜任这一历史任务的原因在于公共精神的缺乏, 因此, 对于绅士阶层的现代政治教育, 是他们在晚清的大变革形势下更好发挥作用的前提。
- ② “自群学观念传入中国后, 新知识分子群体相对来说都比较重视社会团体的作用, 京师=上海两地强学会相继成立之后, 风气所及, 各地的维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当京师强学会被清政府强行封闭之后, 并没有真正遏制新知识分子的结社风气的蔓延, 相反, 这一极端的措施却促进新知识分子离开京师, 利用清政府政治统治力量不平衡和各地开明官僚的力量, 创办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参见: 马勇. 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 1895—1900[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34.
- ③ 康有为在事后回忆说: “中国风气, 向来散漫, 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 不敢相聚讲求, 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 开知识, 非合大群不可, 且必合大群而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楼宇烈整理. 康南海自编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9.
- ④ 强学会在开始时已多受磨难, 戊戌年保国会遭潘庆澜奏劾而安然无恙, 次年康有为述其原因时说: “盖吾正月之折, 以请开社会局, 明会党之善, 又编《日本会党考》, 附《日本变政记》进呈, 上知各国通行之俗, 以开民智而励士气者, 故不禁也。”但好景不长, 强学会终难逃被禁的命运。汤志钧编.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63.
- ⑤ 这点可以在“社团改进会”的申办文书中找到佐证, 谭人凤等人向民国内务部警政司申办“社团改进会”, 在呈文中称: 溯自满族入关, 明末遗老创立洪老会, 蓄志排满, 其杀人越货, 皆根于复仇主义而来。聚千百万无名之英雄, 成三百年无形之团体。逮乎近世, 势力愈张, 义军之起, 无役不与, 在满清目之匪党, 在民国实不得不目之功臣。今共和成立, 五族一家, 种姓之观念已消, 而秘密之机关尚在, 徒党既众, 良莠难齐, 目的一差, 祸机将烈, 禁之则法令难于编辑, 听之则不戢, 必致自焚, 载舟覆舟, 可为深惧。查此辈质直好义, 是其所长, 桎鲁无知, 是其所短。用之不善, 则庚子一役, 几酿瓜分, 训之有方, 则武汉一呼, 遂成革命。李安庆编. 社团改进会群进会申请立案档选[C]//历史档案. 1982:(1), 36.
- ⑥ 清廷随后下令拟订政事结社条规: “各国君主立宪政体, 率皆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 而施行庶政, 裁决舆论, 仍自朝廷主之。民间集会结社, 暨一切言论著作, 莫不有法律为之范围, 各国从无以破坏纲纪、干犯名义为立宪者。”“不晓事体者, 遇有内外政事, 辄借口立宪, 相率干预, 一唱百和, 肆意簧鼓, 以讹传讹, 侵寻日久, 深恐谬说蜂起, 淆乱黑白, 下陵上替, 纲纪荡然。”“民情固不可不达, 而民气断不可使嚣, 立宪国之臣民, 皆须尊崇秩序, 保守平和。”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3—54.
- ⑦ 《结社集会律》颁布后, 各种政事性结社便照章行事, 以此律令的规定为依据进行申报。1908年, 杨度等人依据此律令第二条通过清廷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向民政部申请在京开办“宪政公

会北京支会”, 在巡警总厅转呈民政部的公文中, 杨度言: “窃以为朝廷预备立宪以来, 职等(杨度当时为候补四品京官)外鉴于国势之侵袭, 内感于民情之涣散, 知非集合同志, 固为团结, 必不足以尽宪政推行之实, 起人民责任之心, 因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发起一宪政讲习会, 专以讲习宪政为主。……数月以来, 主义渐昌, 因于去年十二月扩张为宪政公会, 设置会员名册, 为永久存立之基础, 即为将来政党之预备。”中文后附有宪政公会的章程, 其宗旨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参见: 丁进军. 有关宪政公会的几件史料[J]. 历史档案, 1992:(2): 64—64.

- ⑧ 奏折称: 结社集会种类甚多, “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 其他团体“但令宗旨无愧于治安, 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在欧西立宪各国, 国愈进步, 结社集会之风愈盛。“论其功用, 实足以增进文化, 裨益治理。然使漫无限制, 则又不能无言噤事杂之虞。是以各国既以人民结社集会之自由明定之于宪法, 而又特设各种律令以范围之。其中政治社会关系尤重, 故国家之防范亦弥严, 先事则有呈报, 以杜患于未萌, 临事则有稽查, 以应变于俄顷, 上收兼听并观之益, 而下鲜嚣张凌乱之风。立宪精义, 实存于此。”参见: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5859—5860.
- ⑨ 1910年8月, 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就《结社集会律》通过一项议案, 请求资政院修改。该议章指出: 各国宪法均许人民自由结社集会, 我国刚刚预备立宪, “亟须膺国民政治之知识”。禁止教育结社集会, 与要国民具有政治知识的本旨相背驰, 与现行各项法律相矛盾, 对教育政策也大有妨碍, “应行删除”。“限制人数, 于法理不合”, “纯属立法者之任意规定”, “东西各国无此全无根据之法律”, “事实上亦无实效”, “于政策上尤生重大之恶果”, “本条应全删”。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编.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议决案汇录[C]. 1910年铅印本: 25—29.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2] 蔡尚思, 方行. 谭嗣同全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4]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M].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3.
- [5]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张玉法. 清季的立宪团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 [7] 海野宏. 秘密结社的世界史[M]. 黄静仪译. 台北: 城邦文化出版, 2007.
- [8] 马勇. 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1895—1900[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9] 汤志钧. 陶成章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0] 姜涛, 卞修跃. 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到1864[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2] 马勇. 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1895—1900[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895)[M]. 刘尊棋.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 [14] 张玉法. 清季的立宪团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 所, 1975.
- [15] 何宗美.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16]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 康有为与保皇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17] 宗方小太郎. 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M]. 冯正宝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8]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1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0] 佚名:论结社集会律[N]. 申报, 1907-12-24.
- [21] 保廷梁. 大清宪法论[M]. 上海: 上海模范书局, 江左书林, 1910.
- [22]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会议录:第二册[M].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宣统二年铅印本.

Government's attitude to associ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LIU Kanglei, YANG Tianyi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250022, China;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Late Qing Dynasty has problems both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which gave secret societies a chance to develop itsel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the Chinese accepted the western political ideas gradually. The secret society and the newly-born organizations combined to form a big power, which had a major impact on political life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ssociation; secret society

[编辑: 苏慧]

(上接 18 页)

The American factors for Latin America's leftism in its political circles

LUO Huijun

(School of Polit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leftism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for recent years. Among the factors which lead to the rise of left political forces, the U.S.A.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 Firstly, America's hegemony over Latin America has given rise to the discontentment and opposition of the latter. Secondly, in recent years, the neoliberal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conducted by the U.S.A. came to a failure. Thirdly, America has neglecte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Latin America, meanwhile it spread the democracy to Latin America which consequently gave opportunities for the left political forces to come to power. All these policy behavior has become a catalyst for Latin America's leftism.

Key Word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left-leaning"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Consensus*; neo-liberal economy;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编辑: 颜关明]